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方世南

核心提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任务。“共建共治共享”这三个“共”字串联在一起富有深意,突出了在社会治理中各种资源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的重大价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促进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党政领导负责与政社互动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刚性的法治规约与柔性的文化教育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

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

协调好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推动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过程中相互促进,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首要任务。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绝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各级党组织都肩负着的一项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融为一体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建设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和空洞的,而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以及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紧密相关。党的建设包含社会治理,搞好社会治理,离不开党建,党的建设是否有成效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在推进社

会治理中,党建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创新不能守旧。只有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和渗透到社会治理全过程,才能从讲政治高度推进社会治理,保障社会治理的政治方向,切实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各级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应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社会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弱化、虚化、边缘化

问题。为此,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从严落实管党治党的重大政治责任,以抓组织力提升为重点,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党建的覆盖范围,使基层党建不仅到县、乡镇、街道以及村屯、社区,还要覆盖到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以及各类企业,以党建活动全覆盖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促进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制度设计、制度完善、制度创新是关键。要结合社会治理实践,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应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挑战,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将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紧密结合与相互融合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战斗力,并在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党建质量,推动各级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构建法治、自治、德治、共治“四治一体”治理体系的能力,不断提高公信力、凝聚力、吸引力。在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建设中,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相关内容指标纳入其中,作为检查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利于推动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和有机融合。

党政领导负责与政社互动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

协调好党政领导负责与政社互动的辩证关系,推动两者在相互分工、各司其职、相互融合中相互促进,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针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依法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按照十九大报告的基本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就是要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行动起来,构建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实现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要将传统的党政主导、领导、负责以及作为单一行动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负责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政社合作互动模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走

向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治理,并形成党委、政府、企业和社区、社会组织多方协同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通过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商对话机制,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一线,开创党政与社会多元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予以合作治理的善治局面。

为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在党政领导和负责下,有序而积极地发展群众自治组织,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民主协商格局,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话语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推动形成以居委会和村

委会为中心,组织起多种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会自治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社会保障、民生诉求、公共事务协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按照社会治理应当最大程度地社会化的理念,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应积极培育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提高其能力素质,使之能够主动承接部分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反映社情民意、提供咨询建议、规范群体行为的积极作用。

党政领导和负责社会治理,对党政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应以法治型党组织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用法治规范权力,养成法治思维习惯,提

高依法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在领导社会治理中能自觉按照宪法、法律和党规党纪办事,尊重宪法、法律和党规党纪的权威,在宪法、法律和党规党纪范围内开展活动,依照宪法、法律和党规党纪的要求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主动接受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按照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提高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意识和能力水平,营造优良的民主监督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将监督制度化,从而自觉将法治文化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和政府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将法治思维和法治原则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用法治文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法治社会、法治市场等的建设,切实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刚性法治规约与柔性文化教育的有机整合和同向发力

协调好刚性的法治规约与柔性的文化教育的辩证关系,形成刚柔并济、相得益彰的效果,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做法。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社会治理主要依靠法治,法治作为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规范,有助于确保社会治理中的人民主体性,彰显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推进法治建设和加强社会治理是为了人民、保护

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以保障人民包括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权益在内的整体性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多样渠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促进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社会治理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够有效协调社会治理体系,保障人们对于社会治理规则体系的遵守执行,也才能够督促任何组织、机构、单位和个人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都依照宪法和法律维护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

职责。依靠法治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打击力度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有助于形成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的局面。总之,没有法治,就达不到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

在推进社会治理中依靠刚性的法治规约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法治并不是万能的,光靠法治并不能顺利地达到理想的善治目的。因为,再完善再美好的制度都需要与优良的文化相结合,法治的刚性规约只有与德治的柔性法治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推进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管,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教,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明教养,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只有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才能营造高质量的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也才能形成社会治理效能上升和社会治理成本下降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上没有权威的法治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教育,以及对于劳动模范、道德楷模等的宣传教育,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整体建设中,促进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社会治安防控到社会矛盾化解再到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步入善治发展阶段。

(作者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能对党绝对忠诚

樊庆江

百家之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对党具有深厚感情并保持绝对忠诚,是最根本最朴素最真切的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政治品质,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根本前提,也是党员干部强化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的终身课题。

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能夯实信仰之基,对党绝对忠诚。感情有多深厚,信仰就会有多虔诚,信念就会有多坚定。在深厚感情积淀的信仰,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必然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碧血丹心,一心向党,一切为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奉献一切,“不怕牺牲”“永不叛党”。“虽九死而不悔”,无数革命先烈正因为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铸就了“真信仰”“铁忠诚”。面对敌人的屠刀,革命先烈方志敏大义凛然写下千古绝唱:敌人可以砍下我们的头颅,却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走过的路无怨无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志颖其一生,为我们树立了对党绝对忠诚、对党无限深情的光辉典范。

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能对党绝对忠诚,迸发强大的内生动力。对党的绝对忠诚源于情发于心见于行。对党具有深厚感情,在

实践中必然会自觉将党的纲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继而转化为强大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真正践行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同心同德,始终确保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对党有深厚感情,自然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党分忧、为国尽忠、为民解难的不竭动力。

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能对党绝对忠诚,真正成为未来发展的力量与希望。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力量与希望,是否对党具有深厚感情并保持绝对忠诚,不具备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未来发展成败。理想信念上的动摇与滑坡往往是从感情上的疏远、淡漠开始的。因此,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刻反躬自省:是否还记得党旗下自己的铮铮誓言与庄严承诺?是否还胸怀信仰、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深厚感情与火热初心?党员干部只有对党具有深厚感情,才能对党绝对忠诚,真正做到一生爱党至死不渝,一心向党无怨无悔,一切为党无反顾,从而真正成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信得过、靠得住、打得赢的力量与希望。



在幻想天上掉馅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脚下有陷阱。
作者 薛飞

新视界 SHIJIE

革命文化具有特殊时代价值

潘宏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当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今天,为革命文化找准定位,体现其当代价值,便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

革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中国革命铸就的红色底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文化的主创者。中国革命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旗帜也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确切地说,红色仅是一种象征意义,但革命文化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根”与“魂”,由此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牢记初心”的本意,不忘“所由出,知何往”。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精神特质。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其鲜明的精神特质中。革命性,主要包括理论的革命性和实践的革命性;民族性,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现成词句,永远都体现出最贴近中国现实的思想方法;大众性,中国的劳苦大众,在中国革命先进分子们抛开自身优越生活,投身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行为中,看到了榜样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于是成就了革命文化的大众特性;时代性,以长征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时尚”是崇尚坚定信仰、崇尚对党忠诚;创新性,革命文化中包含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

革命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源于与当代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契合。革命文化是在中国新民

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除了它本身的精神特质外,革命文化与当代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存在部分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走进任何一个中国革命文化遗址,都会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即是革命文化当代价值体现的一个层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文化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一是助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革命文化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助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与革命文化具有共同思想基础。三是助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革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出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革命文化的内在呈现。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四是助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革命文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所以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是其鲜明特点;时代性,同时,革命文化又有多彩的文艺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因而也最容易扎根于广大群众中。这一点在当下尤为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以力避借革命文化之名,行低俗庸俗媚俗文化之实。五是助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培育壮大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罗明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重点从“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方面完善改革思路。积极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必然之举。在辽宁“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独特作用,事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全局。通过实施辽宁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板,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短板,提高县域经济在全国的竞争力,提高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地位。发展辽宁县域经济,要注重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坚持发展理念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激活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

培育壮大县域企业发展新动能。积极培育发展中小微企业,促进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发展。依托辽宁重点发展的八大工业门类,培育专业突出、发展基础较好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小巨人企业。为县域小微企业提供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促进企业开拓市场,扩大经营规模。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一批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创业载体。积极培育工业配套条件,服务省内重点产业,提升配套能力。大力发展汽车制造、数控机床、

轨道交通、重大装备和重点产品配套的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模具、基础元器件等产业。积极围绕省内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面向企业需求,提高本地配套服务能力,建设本地配套服务基地。积极推动工业产业园区建设,培育特色产业集聚区。引导工业企业向产业园区集聚,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全面满足入驻企业公共服务需求。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特别是吸引北京、上海、江苏等对口合作省市的企业机构来辽拓展业务。推动工业园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打好基础。

培育壮大县域农业发展新动能。发挥农业优势,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满足新时代城乡居民的高质量消费需求,发展壮大粮油、畜产品、果蔬、水产品、林特产品等精深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园区集聚,吸引终端产品生产企业落户园区,建设优势特色产业深加工集聚区。拉长原料主产区产业链,提高特色产业技术含量。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发展“互联网+”新型农业产业模式,加快农村流通现代化。发挥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培育农业合作新模式。积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倡导“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实现农业龙头企业与普通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互利共赢。积极培育农产品品牌,提高质量效益。积极推动创建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区域品牌,保护好现有品牌。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打造农产品销售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农业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培育壮大县域服务业发展新动能。积极培育服务业集聚区,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利用县域优势,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物流配送、金融服务等业态发展。促进服务业集聚区提档升级,发展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推动医养结合的健康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便利农民生产生活。加快电子商务与农村实体经济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促进农产品、农业生态产品、农业服务业扩大销售。加大县域电商培训力度,培育特色本土电商平台。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功能多样、设施完备的休闲观光园区和旅游景区。培育一批森林度假、山地休闲、温泉滑雪、花卉中药材观赏、乡村民宿等特色旅游产品,发展一批农家乐等特色村。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塑造小城镇宜居宜业环境,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激活政府服务效能。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理念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贯穿到县域经济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于摒弃旧的发展方式、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激发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提升乡镇财政基本保障能力,调动乡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积极化解政府债务,降低债务风险。深化园区管理体制创新,积极改变园区集聚人口少、重大项目少、有效产出少的不利局面。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实行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精简高效的县域产业园区管理模式。创新产业园区用人机制,构建全员聘用、竞争上岗、能上能下、权责统一的管理制度。推动“放管服”改革,提高承接审批和服务能力,提高县域政府服务效率。全面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打造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适应市场发展趋势,在营商环境的卡点、堵点、痛点方面下功夫。在工程建设方面,尤其是要显著缩短开工时间,实施“多规合一”“多评合一”“联合审图”“联合踏勘”等审批新模式。针对各方关注的园区整体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评价等区域评估,推进“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等改革。分类有序推进县域发展,完善政务服务考核奖惩机制。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